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智识生活社会学

[美] 史蒂夫·富勒 (Steve Fuller) 著 焦小婷 译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智识生活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

[美] 史蒂夫·富勒 (Steve Fuller) 著 焦小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247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识生活社会学/(美)富勒(Steve Fuller)著;焦小婷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培文书系·社会理论新视角)

ISBN 978-7-301-19709-7

I. ①智… II. ①富… ②焦… III. ①知识分子—研究 IV. ①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7558号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 by Steve Fuller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age Publications of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and Singapore. © Steve Fuller 2009.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 Sage 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书 名:智识生活社会学

著作责任者:[美]史蒂夫·富勒 著 焦小婷 译

责任编辑:徐文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9709-7/C·0712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pw@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20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 印张 26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引言

在我迄今为止所写的书里面，本书可能是最具自我例证性的一部：从开始构思，到写下这些文字，全都源于我在其角色、职位及其活动场域方面的参与。其综合效应让我得出这一结论：一种具有启发性的生活可能缘起于一个充满热情的书写者。它意味着一种体验式演出，在这一演出中，我既是写作者，又是表演者。所以，在此我不仅要感谢以下诸位专业学术同行（Stefan Gattei、Ivor Goodson、Alan Haworth、Ian Jarvie、Ouyang Kang、Douglas Kellner、Gregor McClennan、Hugo Mendes、Tom Osborne、Raphael Sassower、Nico Stehr）以各自的方法启迪了我的思想，还要感谢以 Julian Baggini（《哲学家杂志》）、George Reisch（Open Court 出版社出版的流行文化和哲学系列）、全球原创评论联盟（Project Syndicate，一个与 George Soros 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相关的全球性出版组织）、《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伦敦）为代表的学界外人士及媒体。

我依照自己的社会认识论，将本书分为四部分。社会认识论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关注生产及传播知识的经验主义基础及规范性基础。我所认为的社会认识论，主要关注与学术学科相关的知识的组织形式。书中探讨的社会认识论主题，可以按照理解本书四章安排的方式来论述。从历史观点来看，

有一专门机构，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知识自由的形式，这一形式一直竭力想要成为促进社会进步转型的工具。这一机构就是大学，人们视其为所有专业知识的基础和最终的融合剂，尤其是在它于 19 世纪变身为“学术自由”或理论上所谓的“哲学”场所之后。这种思想主要起源于洪堡^[1]，洪堡认为自己是在应用康德的批判哲学，这一哲学形塑了启蒙运动的诸多方面。他设想，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大学教育，他们将会获得智识上的自主权（即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进而在民主论坛中根据民意为自己作出抉择。因此，本书前三章围绕洪堡的原创思想展开论述：第一章探讨了大学，第二章探问了哲学，第三章探究了知识分子。

不过，洪堡的思想与本书内容并非完全契合。过去二百年间，学术生活已经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事实上，学术生活把人们训练得是如此之好，其研究工作变得也是如此的社会化，以至于它不得不在其自由探索这一精神层面，不断抵御来自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双重限制。这一抵御经常呈现出一种反学科姿态，其特点就是即兴表现形式 (*improvisational forms of expression*)：剽窃和扯淡狼狽为奸，精明的学者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习惯性地走过了头。我有一个小小的奢望：如果大家读过前三章感觉有些憋闷的话，希望第四章能让大家放松一下，至少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气氛。

[1]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德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家，著名教育改革家，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目 录

引 言.....	3
第一章 智识生活的场所——大学	1
第二章 智识生活的内容——哲学	49
第三章 智识生活的人群——知识分子	97
第四章 智识生活的即兴性.....	165
论点总结.....	189
参考文献.....	193

第一章

智识生活的场所——大学

大学作为解决知识问题的一种机制

至少是从笛卡尔开始，知识问题就已被彻头彻尾地提了出来，即知识作为一个每位个体都要面对的问题，通过个体有意无意地去靠近一个外在的标准这种方式被提了出来。但像“认知路径可能是件稀有品，一个个体获得知识，可能会对其他个体获得知识形成阻碍、提出挑战或要求”这种说法，则是没有道理的。相反，福利经济学家们把知识称作“共用物品”，即其价值不会随着更多人获得它而衰减 (Samuelson, 1969)。而我个人基于对社会认识论的理解，从外到内提出了有关知识的问题，即，因为个体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替代性的行动方案中作出选择，并且心里完全清楚资源有限、其他个体也会同时作出类似选择，结果便是：要想实现某些可能性，就要以牺牲别人为代价。我把这一问题称为认知公正 (epistemic justice) (Fuller, 2007a, pp.24—9)。它蕴含着知识者 (knower) 的一种形象，即作为从事“知识管理”的“受缚的理性主义者”。这一思路一直贯穿在我思考社会认识论的过程中，甚至也贯穿了我博士论文(1985)写作的始终，当然也贯穿到了《社

会认识论》发表后的今天。“认知公正”把知识认定成一种地位商品(positional good)(Hirsch, 1977)。对解读历史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和孕育知识的机构(尤其是大学)来说,这一论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中,“力量”一词关系到扩展及压制行为的可能性。知识可以通过压制他者可能的行为,来扩展知识者行为的可能性。这些“他者”,既可能是知识者的同僚,也可能是“无知”的自然实体及人造实体。广义上对“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口号的理解,包括其所有信奉者(如柏拉图、培根、孔德和福柯)的关注兴趣。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口号的指向上:我们应把重点放在行为可能性的开始还是结束?如果是前者,知识者的范围就可能受限;如果是后者,知识者的范围就会扩展。无论如何,只要你至今还未掌握知识,我的知识就将会为你提供优势;因此,知识是一种“地位商品”。这一概念同时也可用来解释那种对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持精神分裂型态度,大学机构就是这一态度的缩影。简言之,我们从事科研的目的,在于扩展自身行为的能力,但我们的教学,却是为了把学生从他人既成或可能的行为影响中解救出来。

在现实生活中,大学扮演着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这一双重角色,并因之而被卷入一个创造并毁灭“社会资本”的无尽的怪圈。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个别小团体以知识的形式,借助集体的能力而行动这一相对优势(Stehr, 1994)。因此,作为研究者,学者们创造了社会资本,因为知识的创新必定意味着精英的产生,而只有那些处于最前沿的人才会被称为精英;而作为教师,学者们又在破坏着社会资本,即他们把这些新观念告之于众,进而减少了那些处于最前沿的人的既得利益。熊彼特(Schumpeter, 1950)^[1]曾把企业家称为资本主义市场中“有创造力的破坏者”(creative destroyer),其实大学拥有的又何尝不是一个“元企业”(meta-entrepreneurial)

[1]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 1883—1950),奥裔美籍经济学家,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以“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解释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趋于灭亡的结局,而闻名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继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一书中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在《经济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加以运用和发挥,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创新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作用。

式的机构，并起着一种酝酿社会大变革的熔炉的作用。

然而，如果大学脱离了这一系统背景，它的影响就会显得很反常。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追求证书的人越多，证书就越会贬值。事实上，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士乃至硕士学位，都已不再享有从前那样的优势。人们往往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大学教育教学质量低下，或是职业培训没有针对性等。事实上，学位优势丧失的原因很简单，很可能只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求职者都拥有相关的学位而已。因此，盲目地归责大学教育实属不妥。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已经失去了它以前的威力。对此，一种比较自然的学术反应，理应号召人们进行更多的科研工作，以便有效地辨别当下学位持有者的良莠，或是设立更高的学位，在徒劳地追求所谓证书的过程中，把新知识灌输给他们（Collins, 1979）。这一策略甚至还被有效地用到了学界内部，因为如今博士已经占据所有常规性教师职业，尽管招收博士的标准遵照的依然是其研究潜能，对他们的培养遵循的也依然是拟定好的研究方案。

科学研究历来都被视为一种精英活动，但是，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的狭隘性/封闭性（这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身份），却趋向于推翻新知识的创造者和投资者所享有的一切固有优势。掌控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理想，随着19世纪初德国对大学进行的彻底改革，得到了最有力的哲学辩护。这一理想渴望构建一种在潜在的应用及其应用者两方面都具有“普适性”的知识形式。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一理想被重塑成福利国家的双重经济功能：补贴资本主义的生产（研究），重新分配其剩余额（教学）。这一时期正值大学扩大其规模、夸大其重要性之时，然而，福利国家新近的权力移交，却使其陷入金融和更大的公共机构的不确定性中（Krause, 1996）。近年来，驱使大学模拟厂商成为知识产权发动者的动力，已经发展成为一场不亚于解体大学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学的研究功能和教学功能被割裂开来。由此出现了准私有的“科学公园”，它那有利可图的冒险，危及知识的正常流向，并为创造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阶级结构，又称信息封建主义（information feudalism）^[2]，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构架。下一节，我将重点阐释这种状况的完

[2] 《信息封建主义》，（澳）约翰·布雷斯韦特、彼得·达沃豪斯著，刘雪涛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9月版。

整含义，随后我会将其阐释为第三级资本主义的一个实例，第三级资本主义试图在资本主义内部悖论性地重现一种资本主义意欲消除的社会机构。

我们所谓的“知识社会”中知识的可转让性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知识社会”这一标签有何与众不同之处。任何不熟悉社会学理论的人都能看出，在社会的组织和发展中，知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同的是，“知识社会”这一说法却似乎有意隐藏了什么。要了解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知识话语中去探究与“知识”一词有着相同语义群的词汇：专业知识或技能 (expertise)、资格证书 (credentials)、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它们都是知识社会中的臣民们所拥有或可以获得的东西。这三个词汇是按照可转让性的顺序从小到大排列的。我们先从可转让性最小的“专业知识”一词说起。

我本人专业知识的取得，与我人格相关方面知识的获得，并没有太大差别。事实上，我的专业知识相对而言的不可转让状态，使得我在论述古典哲学中处理知识的手法方面，比起论述我曾提到的“燃素学”，更不容易驾驭。“燃素学” (phlogistemology) 这一名称，来源于 18 世纪那个易变的化学物质：燃素 (phlogiston)^[3]，它的特征是，完全按照其在燃烧试验中其他已知因素都燃尽后剩下的物质来界定。界定这一化学革命的时刻，发生在 18 世纪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意识到，化学家们称为“燃素”的元素，因燃烧环境不同，有时是氧，有时又是氮。以此类推，“专业知识”并不是指那些独特的心智，而很可能是指多种行为倾向 (behavioural dispositions)，我们目前对它们的神秘化也不过如此。

具体来说，我在自己 1996 年的专著中认为，专业知识应该具有以下几种燃素学特点：

第一，专业知识不可以简化为一种正式程序或一套行为标志。但是，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在真实的生活环境里，可以作出恰当的社会

[3] phlogiston, 古代认为可燃物中存在的燃素。

认识论评判。

第二，同样的行为，因为当事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可被看做其表现出了或未表现出其专业知识。（比如，一位新手犯下的错误，如果是由一位熟练的从业者所犯，可能会被视为是种创新。）

第三，专业知识存在与否，几乎没有直接证据。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出现分裂/断裂的情况下，则被“假定”存在。

第四，相反，当人的思想与行为出现争议时，专业知识就开始对人的基本能力作出一种缺省解释（default explanation）。（例如，你可以不同意我的某一观点，但这并不能表明我的观点就是不对的。）

第五，否定某人的专业知识，至少可被视作一种与社会评判或认识评判相同的道德评判，由此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指控：相对于对被审议人的误解来说，否认者不仅仅是挑剔的，更是无情的。

我们可以将专业知识置于可转让性的连续统中来进行考察。转让性通过专业知识是可以“获得”的这一极为常见的知识社会习语，自然会引出学位证书和知识产权问题。这一特点在上述第二点中已经提到。即，如果我曾经历过某种制度，那么，比起我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的行为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为了欣赏到这一过程中燃素学的特质，我们先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行为的一部分，行动本身在这一制度实施前后并不会有太大改观。相反，真正改变了的是语境，以及紧随这些行动之后的一系列反应。这一观点以“图灵测试”^[4]的方式，在知识社会的破晓时分，被提升为形而上难题。图灵测试假定人们分不清人类与机器的发声，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只知道给出的句子是由真正的人而非“人工”智能机器发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前者的表达赋予无尽的语义深度，而把后者的表达贬低为一种浅薄的、预先设置好的回应（Fuller, 2002a, 第三章）。

然而，我们大可不必破坏人与非人的界限来阐明这一观点。学生们往往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常常很难忘记老师布置的阅读作业中一些激进的言论。最合适的答案莫过于：学生们在阅读中所碰到的作者们，能就他们的言

[4] **turing test**, 英国数学家图灵于1950年提出用来判断计算机是否能够思考的方案。方法是分别由人和计算机来同时回答某人提出的各种问题。

论自圆其说，学生们则未必能就同一言论自圆其说。当然，我们这些为人师表者，不说没有也是很少会有人真正去检定这一假说。我们反倒会把下面这一假说当成前提：在我们质疑专家们的专业知识前，他们必定会被正规性的认证考试所击败；然而这些考试往往都是间接进行，更何况考试结果总是充满争议（例如，不标明引用被视作无效力）。与此相反，学生们在成为专家之前，却必须通过那些被明确界定过的、经常采用的、大都是没有异议的考试题目。我们通常都会认定，任课的专业老师们毕业于名牌学校，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作品在著名出版社出版，且颇受同行专家的认可，他们拥有的广博知识为学生所不知。拥有这一资格证书的后果是：人们赋予专家们以资质，让其传授那些与其资格考试内容、甚或是与其新书内容毫不相干的内容。

知识一旦开始跟知识者相疏离，人们便需要获取一些新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内容，在解释资格证书的拥有者是如何把知识授予他人时，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在那些攻读学位主要是为了掌握在工作或其他生活经历中已经拥有的知识的人眼里，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仅此一点，就使“知识社会”这一表达方式变得极具误导性。因为知识通常是按其内容来界定，比如它或多或少能反映现实、没有知识人们将无法工作。但这也意味着，在知识社会中，知识的“储藏器”意义非凡。比如，所讲内容是出自哈佛大学的博士，还是出自一位辍学的中学生，结果会大相径庭。一个人的知识的可靠性和可信度，不见得只有在攻读学位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提升，但“一个人拥有的知识会使大家认可这些资质”这一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哈佛大学的辍学者要是有足够的资本后盾和产品交付的话，他也会有这样的权威。比尔·盖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知识社会”这一说法具有一定启发性，它可能会传递给人们这样一种讯息：社会结构是可以重建的。阿尔玛·梅特（Alma Mater）曾把生得权（birthright）视作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大学教师已经替代了家庭和牧师，成为社会地位的首要决定者。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正规教育实际上与社会意义息息相关这一事实，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大量促进社会进步的不寻常途径（Ringer, 1979）。当知识社会的修辞学大肆赞美“终生学习”的优点，并明显将其与那些在“现实世界”

中已站稳脚跟的人联系到一起时,事实上,这些成年学习者却为了把自己的生活经历转化为资格证书这样的硬通货^[5],而被迫选择重新回到校园。

至此,我们似乎应该考察一下知识的异化问题。用眼下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用以界定知识社会的“空间流”(spatial flows)(Urry, 2000)到底是什么?专业知识的自然产地是工作场所,必需的默会知识在那里得到培养和传播。然而接下来一步,即资格证书,却迫使人们离开全然不同的场地,集中到大学教室里(一个把他们的专业技能通过正规训练方式转变成一种人人认可的社会价值的地方)。认识上的异化和知识产权说,又将其从教室推移至最终的“研究”场所,从而导致人们关注实验室,但却很少触及那些自然科学权威的座盘。对此社会科学有自己的看法,就像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其作品中所说的那样。拉扎斯菲尔德的公众舆论调查表明,默会的社会知识提取,来自于原本生产它们的地方(比如,家庭中),但其结果却被(通过买卖或直接)用来为以产生消费需求或引发选民兴趣为目的的产品制造和政策提供信息源,并会依据代理人属于私有部门还是公共部门而有所不同。如果是前者,它就被称为“广告宣传”,若是后者,则被称为“运动”。说得更明确些,社会科学在萃取知识原料时,要比作为其对手的自然科学更有效力。也就是说,社会知识在萃取前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告知主体种种制约因素,他们必须在这一限制条件中回答所调查的问题。

学术“中间人”的存在,将知识社会与从劳动到技术这一转变区分开,这一转变是大部分人类历史中都有的一个阶段性特质;他们通过迫使知识社会受制于具体程序,将人转换为人工制品。当学者们(大学教师们)只是公务员时,在被直接描述为资本占有(capitalist appropriation)中,他们提供了短期的商业主义。使用商业主义这一类比并不完美,因为大学从未享有处理知识产品的专利权(或是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一权利)。除此之外,随着高等教育半私有化(在美国由来已久,在欧洲正在逐渐提高),以及邻近大学校园的合资办学性质的科学公园与日俱增,学术界最终成了改革的跟屁虫,

[5] hard currency,指价值比较稳定的货币,如当今世界的美元、欧元、英镑等;当某货币的汇价持续上升,习惯上就称其为“趋于坚挺”,称该货币为硬通货;反之则称其为“趋于疲软”和软通货。

被误认为是摇着尾巴的资本主义的走狗。实际上,智识商业主义的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大学的教学功能;即使目前大学的科研功能日益被移交到私人领域,大学的教学功能至少暂时仍处在国家的管辖范围内。

这一结果有点像马克思所说的“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其“亚细亚”式生产模式是指帝国主义强权向其征服国征税,但却对相关国家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关系置之不理。这一点颇似大学教师的作用,他们得到国家授权,可以掌控需要相关资格证书以谋求事业发展的工人们的时间和金钱,而且通常还无需转换工作场地,有时甚至无需转换工人实体性知识(substantive knowledge)。在“东方专制主义”下,征来的税收被反哺到大型公共工程中,以进一步巩固帝国的权力。同理,知识社会的历史中也有这一特点,比如在冷战时代的高潮中被古尔德纳(Gouldner, 1970)^[6]精辟地称为“双福利国家”(welfare-welfare state)所做的如下努力:加大医疗保健覆盖面,扩大教育通道,通过大量的电子信息和网络传媒等方式,笼络民众,大力提高其监视和军事能力。国家创立的这些项目,使得二战后的一代人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激增,尤其是在紧随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的1957年。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超级大国之间敌对情绪的减弱而出现的巨大的政府预算负担,一些大公司和特殊利益群体,纷纷把这些项目据为己有。由此导致的政治分权化和标准分裂,与“后现代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思想及“新自由主义”这一统治形式的出现不无关联。这些发展变化,通常被认定为资本主义在向先前得到福利国家政府保护的社会领域渗透。我们无需否认这一断言的真实性,我们一旦把知识社会初建时的基础设施建设视作近代“东方专制主义”的翻版,巨大的信息和网络媒体的私有化,就更像罗马帝国沦落为中世纪欧洲典型的封建封地和自由城邦。

因此,在知识社会支持者的边缘地带,活跃着一群理论家,他们预言了“信息封建主义”(Draho, 1995)的到来,并不让人吃惊。这一返祖性转化的证据何在?下面三点足以证明:

[6] Alwin Gouldner, 1920—1980, 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为《工业官僚体制的模式》(1955)、《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1970)、《意识形态和技术的辩证法》(1976)等。

第一，人类的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变得日益短暂，但只是部分因为越来越多的机械化手段替代了它。其他原因则是，这些新机器，比如专家系统，越来越多地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像专利、版权或商标），从而可以从那些设法降低全部生产成本的人那里榨取租金。法律体系以鼓励创新为名，将资本主义追求利益的目的，有效地转化为封建制度对租子的追求。这一转化始于工业革命时期，因为在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系统化地改革许可证的利益之前，知识产权的许可早已由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自行决定了。人们无法期望整个知识空间最终会像封建制度下的实际空间一样，被分隔成互不相干的领域。对他们来说，美国的开国者主要关心的是保证个人言论自由（这一点不仅不能谴责，而且不能模仿）和集体财富生产（假定政府一定会从各项发明的经济利益中获取最大利益）。考虑到过去两个世纪中资本跨国流动日益增强，知识产权法规似乎会以牺牲后者为代价而达到前者的目的。

第二，职业对资格证书的要求越高，与获得那些证书（对最终被雇非常重要）相关的知识含量就越少。这主要是因为，资格证书已不再能确保拥有者可以找到工作，而只是找到工作的一个必要条件。这样一来，资格证书就从一个授权准则，摇身变成排他性的标签。在这种情势下，它们成了继种族和阶级之后歧视和划分民众的首要机制。资格证书也像种族和阶级一样，没能成为指引人们走向事业腾达的标志，反倒成了人们怨恨的避雷针。随着资格证书这一封建残余被揭穿，私有化的非学术性培训中心，开始逐渐削弱大学所享有的实际垄断权。但更重要也更可笑的是，比起那些拥有传统“非学术性”尤其是创业型知识的人，拥有过量学术资历的人更有竞争优势。这在自然科学界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专业”科学家们率先出入于科研界，在技能和广泛用于各种各样项目的仪器方面投资，建构他们的知识产品，以便从它们的使用者身上榨取某种“献金”（将其变成参考文献或专利版税中的一项财政颂词）。“知识工程师”设计出计算机，模拟出一个领域内的专门知识，以打败更多的学界竞争者。这些模拟的原材料，当然是专家自己，他们在知识产生出其预期回报的最大值后，欣

喜地出售着自己的知识。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最为清楚地看到一个楔子(即制造分裂):知识社会在大学的两大功能(教学和科研)之间驱动,因为科研不仅没有服务于教学,反而通过私有化现象阻止了教育的进程,或是通过自动化使教学落伍过时(Fuller, 2002a)。

第三,常用“爆炸”来描述的现今超量可用的信息,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信息匮乏一样,都能延缓智力前进的总步伐。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发明完善活版印刷之前,书本还无法被成批地印刷出来,因此,作家们根本想不到他们的读者将来会有权使用图书馆。这意味着,大部分原文都交付给读者,任其获取他们需要的知识,以了解作者了不起的贡献。不幸的是,这一任务如此费力,人们把更多的精力都花在了总结和批评过往上,而非推进知识的前沿上(Eisenstein, 1979)。难怪直到古登堡之后,才有了哥白尼革命,尽管太阳中心学挑战地球中心学已有千年之久。不过,当下我们却在承受着相反的问题:原文被投放到市场上的速度,使得任何人都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因此,学者们不是在率领这一队伍前行,而是在队伍中制造干扰,人人都在争相表白,自己在了解他人在做什么方面的不可或缺性。在这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性认识的日益增长,只不过是学者们必须在同行面前界定自身以占据某一被认可的知识地位的策划而已(Fuller, 2000a, 第五章)。这一制度可能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知识社会学有极大关联,它确保了创新只会发生在狭小的职业认可的话语圈子内,从而使得作为社会变化主因的思想的发展前景变得极小(Fuller, 1997, 第七章)。

怀疑这些令人沮丧的预测的读者,可以考虑一下当下对中世纪佚名作家的作品或超文本的计算机化处理。中世纪的文本大体上都是真实的,因而,这些超文本的权威性,是基于其不同评论的层理性所表现出的循环模式来决定的。因为这种文本的真正来源往往不为人知,越来越多的阐释文本又各不相同,几乎不可能使这一文本受限于任何一个固定的批评。相反,人们被迫去“反驳”或“抵抗”超文本,结果便是在自己独立的电子轨道(electronic orbit)上释放出另一个超文本。

以上这些新事态的封建前例，被传递着文本的浓缩 (condensing) 和概述 (surveying) 这一不间断的历史双重性所掩盖，这些文本共同人为地维持着其原创性的知识社会意义。这一历史双重性，包括叠缩化 (telescoping) 和立体化 (stereoscopic) 两个阶段。

一方面，相对较为遥远的过去的历史被叠缩了，自古以来像如今的知识社会一样以知识为基础的复杂而广泛的社会运动，都被瓦解成均匀分布式的理想型，比如“新教”、“启蒙运动”、“社会主义”(Wuthnow, 1989)，这些名称主要是因其独特性而非代表性而得来的。当理性的方法准则被首次用来帮助社会学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普遍性的假设时，它已变成一种在充满档案的世界上使历史遗忘症合法化的策略。因此，任何对当代发展所做的预测，注定都是徒劳无益。

另一方面，对于相对近一点的历史来说，事件则呈立体状，即挑拨两个紧密关联的事态的关系，使其处于一种编造的分界线的对立面。这方面最为清晰而恰当的实例可能是，如今欧洲科学界的政策专家 (policy gurus) 中颇为流行的，知识生产模式一与模式二之间的明显差别 (Gibbons et al., 1994)。它主要用于以实验室为基础的自然科学领域，模式一代表以学科为基础的研究，模式二代表一种杂合意义上的探索，集学术界、国家政府及工业的兴趣和利益于一身。从立体角度来看，模式一的起源可被追溯到 17 世纪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的建立 (如果不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话)，模式二则可以追溯到生产出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初期 (如果不是追溯到后冷战时期福利国家的权力下放的话)。然而，从历史意义上来看，直到 19 世纪后半期，这两种模式才几乎同时在德国出现。实验室由于一种智能化的阶级势利观 (比如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灵敏熟练的手工，这与受过高等教育、无需动手的精英们的工作环境，有着质的差别)，而被带有惯性地从大学中剥离出来 (仅限于理工学院)。然而，实验室科学一旦落脚校园，很快就与政府和工业界人事结为联盟，这方面最著名的当属德国的威廉皇室社会。

事实上，实验室科学如此不同于大学里的传统体制的原因，同样可以使其一旦进入大学校园，便会很好地应对 (适应) 外在的科研项目。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库恩 (Kuhn, 1970) 描述的科学的一个著名特点，它几乎完